

## 編審

過去半年(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中,本所編審張賢勇教授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四項:一、接待海內外來訪的客人。二、編訂審讀文稿,其中比較重要的有《現代國家與大公主義政治思想》三校稿、《道風》積存稿件、王曉朝譯《上帝之城》上卷稿本、Pelikan《基督教傳統》第一卷(序言、幾點說明、第一至第二章全部譯稿及第七章部分譯稿)和《道風》第17期來稿。三、翻譯、撰寫、發表論文若干篇,例如〈吉爾松哲學史論著漢譯兩種〉(書評,已刊《道風》第16期),Pelikan《基督教傳統》第一卷「中譯本說明」以及為國外兩次學術會議撰寫的論文。四、會議、出訪、交流。除了在港粵兩地參加多次學者聚會,如香港建道神學院召開的「華人釋經研討會」和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中華基督教文化中心成立大會暨學術研討會「基督教與大學」(分別主持其中一場的研討),還於2001年11月與本所總監楊熙楠先生聯袂遠赴俄羅斯參加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基督教

國際學術研討會」按着又一同前往柏林,組織並參加本所同德國友好機構「中華資訊中心」聯合主辦的「翻譯與吸納: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遇」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會上同舊雨話舊,與新知談心,會後隨與會的中港臺三地學者參加德國主辦組織的「德國文化之旅」活動。

## 合約研究員／駐國內研究員

- 本所研究員張憲教授於2001年10月至2002年3月完成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2002年12月初,代表研究所赴德國柏林參加「翻譯與吸納: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的會遇」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大會論文:「從交互文化角度看翻譯」,並在大會發言。又在十二月中旬到香港浸會大學參加「基督宗教與大學」學術研討會,提交大會論文「尋路——中國大陸高校開展基督宗教教學與研究之我見」,並在大會發言。

張教授期間亦投入多部翻譯名著的審校工作。

## 道風學術獎:「徐光啟獎」(著作獎)、「艾香德獎」(翻譯獎)

### 目的與發展歷程

為了發展並促進中國國內的基督教學術研究,本所每兩年舉辦一次道風學術獎評選,該獎分為「徐光啟獎」和「艾香德獎」,分別獎勵優秀漢語神學著作和傑出基督教著作的漢語譯本。

有關事工的詳細資料、評選委員和評選程序可瀏覽本所網站(<http://www.iscs.org.hk>)。

### 總決賽果獲獎者

#### (1)「徐光啟獎」(著作獎)

獲獎書目:《中國禮儀之爭》,李天綱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獲獎者:李天綱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 李教授的得獎感言

近十年來,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在中國大陸蓬勃興起的宗教研究熱潮中起了非常重要的組織、引導和推動作用,在這方面已經公認為世界上少數幾個最重要的推動團體之一。學術研究,在形式上是個體行為。從事個人研究,提出獨立見解,解決獨到問題。但是作為這十多年宗教文化研究熱潮的見證者和參與者,我深感有研究所這樣一個團體的推動,個人的研究能夠變得更有效,更有意義,並更為快樂。

《中國禮儀之爭》是我在復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論文。因為時間倉促,這還是一個比較粗糙的作品。但在中文世界缺乏同類研究,而這個問題又相當重要,所以著作出版以後得到同行們的鼓勵和肯定。這次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把今年度的「徐光啟獎」授予《中國禮儀之爭》,是我迄今為止受到的最大的鼓



勵。雖然在此之前已經有過一個獎項,但我會把「徐光啟獎」作為我終生的榮耀。很湊巧,我是上海人;我的

第一篇宗教研究論文是〈徐光啟與明代天主教〉；剛畢業時，我的研究所在上海徐家匯，靠近徐光啟的墓地。所以我和徐光啟有緣。

我目前還在從事基督教和中國近代文化的關係研究。我覺得，基督教和中國的近代性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和基督教在世界其它地方所起的作用既有相似，也有不同。學術研究並不是來判定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這是過去大陸學術研究的缺陷。學術研究首先是理解，而非批評。這樣，不同的文化和信仰才能溝通，互相補充。十七世紀初的時候，徐光啟曾經提出「補儒易佛」的口號，用作基督教和中國文化對話的方案。這個方案今天看來還不夠開放，我們要把基督教跟中國諸信仰和宗教平等看待，不是去變易對方，而是相互地理解和補充，這樣我們的世界既豐富多采，又合乎理想。我衷心地希望基督教漢語文化研究所能夠成為東西方宗教和文明對話的舞台，利用香港文化的有利地位，為中國的文化建設，發揮更大的作用。■



## (2)「艾香德獎」〈翻譯獎〉

獲獎書目：《聖言的傾聽者》，拉納著，朱雁冰譯，北京：三聯書店，1994，共228頁。

原著：Hörer des Wortes, Karl Rahner, Freiburg: Herder, 1941, 634pp.



獲獎者：朱雁冰教授

四川外語學院德語系榮休教授、  
國際日耳曼文學和語言學者聯合會會員

## 朱教授的得獎感言

我十年前譯的《聖言的傾聽者》獲得二〇〇一年第二屆「艾香德獎」使我大感意外。我之感到意外原因有二：其一，我兩年前曾聽說有此獎項，雖然當時也曾有過企望在未來能獲獎的閃念，但有獲獎希望的，自認為用功至深的譯作尚未問世，故亦不曾「念及」《聖言的傾聽者》這部後譯的作品能獲獎；因此，其二，我將獲獎的可能寄望於未來，未料到這獎獲得如此之快，使我大有「喜出望外」之感。《聖言的傾聽者》是我最早譯的基督教神學著作之一，也是我譯的語言上最晦澀難解的一本書。當時，我對基督教神學以及一般意義上的宗教哲學知之甚微，從這個方面講，我完全是一個不稱職的譯者。因此，我為自己立定了一個工作原則：嚴格遵循語言邏輯理解和在譯文中再現拉納所講和所要講的內容，這就是以己（語言知識）之長補己（專門知識）之短。這便有可能在極大程度上保證我避免理解上的想當然和譯文表達上的隨意性。譯本於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在香港出版，一九九四年六月在北京重版，隨後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又重印兩次，這在客觀上似乎是對我至今遵守的工作原則的認可。它今天為我贏得的「艾香德獎」毋寧說也是對我這個工作原則的肯定，對我為之付出的努力的肯定。我為此而深感欣慰。我不會忘記小楓先生對本書中許多概念的譯名的訂正，準確的譯名確有畫龍點睛之妙；我不會忘記編輯先生為本書付出的辛勞。我願藉此機會對他們表示真誠的謝意。最後，我感謝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評選委員會諸同仁對我的譯本的認可，我將這獎項視為對我今後工作的鼓勵和鞭策，我相信我不至使諸位失望。■

